

清代陕西岁时民俗的区域差异*

张晓虹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上海 200433)

提 要 清代陕西省岁时民俗的空间特征,发现岁时节日在省内不同地区节庆活动的内容有所不同,节日时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认为清代陕西省存在着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岁时民俗区。南北自然条件的不同、移民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差异导致了清代陕西岁时民俗三大区域的形成。

关键词 岁时民俗 区域差异 陕西 清代 文化地理

岁时民俗,即按一年各个季节的播移交替,定期举行的祭祖、寒会、娱乐等活动。作为文化景观中最显著的部分,其分布反映了文化的地域差异。由于陕西省内部自然环境与传统文化差异较大,因而其年节活动在北、中、南三个地区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兹以清代的资料为主进行考察,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小年祀灶、元宵节、补天节、四月八日浴佛节及五月初五等节日上,即陕西南北各地这些节日一是时间有别,二是节日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小年有礼类时间虽然只有一日之别,却反映了南北方节日风俗的差异,因为民间有“北三、南四”之说^[1]。也就是说,以腊月二一祭灶是北方的习俗、二十四日祭灶是南方地区普遍的习惯。元宵节、四月八日浴佛节的节期虽然各地无别,但由于自然条件与历史传统的不同,其间的活动有较大的差别。至补天节、五月初五寒龙舟则表现出极强的地域性,即这些节日一般只存在于某一区域,成为该地区异于其他地区的文化景观。

1 清代陕西岁时民俗区划

根据清代陕西各地岁时民俗的差异,可将陕西全省分为三个特征鲜明的区域:陕北区、关中区 and 陕南区。

下面分述各区岁时民俗的主要特点及差异。

1.1 陕北岁时区

这一地区以黄土高原为主体,包括榆林府、绥德州、延安府和鄜州、洛川的广大地区;其岁时民俗具有北方风俗的典型特征。此区岁时的主要特点是:小年祀灶在腊月二十三日,元宵节、四月八日浴佛节的活动比较隆重,并在节日中有一些独特的庆祝活动。区域内部亦有一定差异。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49601008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hina, No. 49601008)。

来稿日期:1997-01-06;收到修改稿日期:1998-09-03。

该区各县均在腊月二十三日晚祀灶¹，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祭祀所用的物品也基本相同，多用糖、饼为之。如康熙《延绥镇志》中载：“（腊月）二十三夜，祀灶神，用糖饼，以糖泥神口，祝曰，毋以恶事诉上帝也”²。有些地方用鸡作为牺牲，显出较隆重的特点。如道光《清涧县志》即云：“二一夜，以雄鸡、糖瓜祭灶神”。林在八月初三再祭灶一次³，与《礼记·月令》所载“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祀灶，祭先师”呼应，不仅表明了这里对灶神信仰的虔诚，而且反映了这一地区文化的历史悠久。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陕北区较为隆重的节日，其间的活动十分丰富，人们一般连闹三日神火，如靖边“上地灯节前后数夜，街市遍张灯火。村民亦各鼓乐为傩，装扮歌舞，俗名神火，义取逐瘟”⁴，安塞县庆贺节日的方式大致相同，也是“男妆女，扮如杂剧，鸣锣击鼓，兼唱春词，名曰‘闹元宵’”⁵。元宵节期间这里还有一种地域性极强的风俗：垒火塔塔，即在正月十五这一日，各家在庭院内及公共场所当地盛产的煤炭块垒成狮、象形状的塔形⁶，点燃后形成一通体透明的火塔，用以元宵节拔祸攘灾之用，当地俗称为火塔。又由于陕北方言中常将最后一字叠读，如陕北民中的山沟沟、兰花花等。故此，当地也将这种火塔称为火塔塔⁷。

陕北俗尚佛教，因此对佛教重要节日的俗佛节十分重视，各县均在四月八日到寺庙作佛会，“四月八日为俗佛辰，僧尼庵多作佛会，街市散豆结缘”⁸。节日期间民间还“以黄米面蒸不饽（俗名饹儿）食之，并互送亲友”⁹。在陕北的部分地区，这一节日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世俗化，演变为求子节。如靖边“四月八日，城乡男女争上城内西山谒子孙娘娘庙，供献花果，求子许愿”¹⁰。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又可发现在陕北区内部，岁时民俗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异，元宵节中火塔塔的分布与俗佛节的节期活动南北明显不同，而正月下旬的节日区内也相差较大，故依这几项内容，陕北区还可再分为两个亚区：榆绥亚区与延安亚区。

1.1.1 榆绥亚区 榆绥亚区包括榆林府、绥德州及相邻的延安府安定县，元宵节燃火塔塔是本亚区特有的习俗，并在正月二十与二十五过两次填仓节。不仅如此，腊月二十三日晚的祀灶也较南部卫生。先看该亚区元宵节的情景。

道光《神木县志》云：“上元，自十四至十六，街市悬灯三夜，放花炮，用石炭垒火塔，

1 乾隆《延长县志》卷之五《风俗志》载：“二十三、四，家家香、楮、鸡、饼、米、糖祭灶，以黄米磨面作黄少尖之。”

2 嘉庆《延安府志》卷三十九《岁时》中亦载道：“（十二月）二十三夜祀灶神用糖饼，以糖泥神口，祝曰：毋以恶事诉上帝也。”

3 道光《榆林府志》载：“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神，献饧、鸡肉，谓新旧神代易，又名送灶。”同书又载“八月初三日，祀神。”

4 光绪《靖边县志稿》，第一卷《风俗志第五》。

5 民国《安塞县志》卷六《风俗》。

6 康熙《延绥镇志》亦载：“火场聚石炭如斗大者，累作幢塔状，或狮、象形然（燃）之，通明竟夜。”

7 民国《米脂县志》载：“（正月）十五日元宵，街市遍张灯火、花炮，以石炭垒作幢塔状，名火塔塔，朗如白昼。”

8 嘉庆《延安府志》，道光《榆林府志》载：“四月八日，为俗佛辰，或作佛会。”道光《神木县志》亦云：“四月八日为佛生日，多赴庵寺吃斋，送五色纸幡于佛殿。”乾隆《府谷县志》卷四《风俗》所载相同：“四月八日为俗佛辰，僧尼庵院作佛事，街市散豆结缘。”道光《安定县志》也是“四月八日为俗佛辰，士兵女争赴兰若进香。”

9 民国《米脂县志》。

10 光绪《靖边县志稿》。

众相剧饮”¹。由于延安府的安定县也“家家累石炭于门前燃之，乡间或燃于茔墓”²，故将该县归于此区。不仅清代陕北北部有此习俗，甚至时至今日当地仍保留了这一风俗，电视纪实片《望长城》中就有榆林群众在正月十五用煤炭块垒成塔形点燃的场面，即可证明。这种燃火塔塔的习俗不见载于其他地区。

检绥亚区各县还分别在正月二十日与二十五日过两次填仓节（或称天仓节）。乾隆《府谷县志》载：“二十日用灰，院内洒圆圈，名为打灰窑，午食米面蒸食，不食粥，夜用米面作灯盏，或作人物捧盏，名曰‘仓官’。凡有窗处，点一、二盏小填仓，二十五日如二十日事，为老填仓。又，此日不开仓，喜进财，忌出财。”其他如神木、绥德州等县也有相似的记载。

1.1.2 延安亚区 即南部的延安府及鄜州北部地区。此区内的各县在正月二十三日举行老君会，其中有“炼干”的内容。四月八日的浴佛节演变为以求子为主的节日。

这一亚区在正月二十三夜过“老君会”，俗谚曰：大忌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当天夜里，“家家院内打火，又淋握布水于火上，谓之‘炼干’。”^③有的地方“聚猪羊骨，杂烧之，”^④也称之为“炼干”。民间认为“炼干”即炼丹。此项活动主要分布在延安府及鄜州北部的洛川县。

四月八日是本亚区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不过此节在该区内的大部分县中已演变为以求子为主，如安塞将四月八日称为“子孙圣母娘娘诞辰”^⑤由此可见，在浴佛节的内容上，延安亚区加入了民间原有信仰的内容，以至在有些地区佛教礼仪已湮没不彰。

1.2 关中岁时区

此区以关中平原为主体，有同州、凤翔二府与邠州、乾州、鄜州南部及西安府中除孝义厅、宁陕厅以外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岁地民俗因地处平原，总的来讲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正如康熙《陇州志》中记载的那样，“四时礼节，如元日、元宵、端阳、七夕、中秋、重阳，拜贺宴会，关中皆同”。尽管如此，该区内元宵节与补天节独具特色，成为区别于他处的重要指标。

乾隆《薄城县志》记载：“元宵，古卜茧期，相袭蒸面茧，粉米煮茶，内外置灯盏，虽几榻、罍釜不遗。二十日，作煎饼投屋上，补天”。这条记载包含了两个信息：其一，元宵切要蒸面茧、遍燃灯盏；其二，正月二十日左右有补天节。这两个特点恰为陕北区、陕南区所元。因此应用区域共轭的区划原则，以这两种习俗共同作为划分关中区的标准。

元宵节期间，关中各地均用麦面蒸制面茧。面茧者，最早见于记载是唐王裕仁撰写的《开元天宝遗事》，其中称“都下上元日（即今元宵节）造面茧，以官位贴子置其中。以高下相胜，为戏笑”。今人有以为面茧即为今元宵的初形，为唐时元宵节的节令食品。《蒲城县志》中明确称正月十五日为“古卜茧期”，再以面草案之名推测，此俗最初之意大约是祈祝新的一年中蚕茧丰收的活动，此又以南方盛产蚕茧地区的江浙一带在正月十五祭表茧神

① 光绪《绥德州志》亦载“人户及闾阖各设灯烛，并以煤块积垒如塔，至夜燃之，光明如昼，以及庙门、社会皆然”

② 道光《安定县志》卷一《輿地志》

③ 民国《安塞县志》卷六《风俗》

④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岁时》

⑤ 民国《安塞县志》

紫姑及雍正《陕西通志》中“(正月)十五日蒸面茧,盖袭古卜茧之遗”的记载,可以得到证明。唐时面茧之形,因无记载,今已不可考,而清代关听面茧,据载是“以酵面蒸制鼠形之饼,名曰茧儿”,“饼中实以枣粮,外以黑豆点鼠眼。”¹

关中除元宵节内容较为独特外,其补天节更是别具一格。补天节,又称天穿节。这一节日一般是由女家长主持,将烙成圆形的薄饼抛到屋顶,谓之补天,有时还向地上、井里,扔几张称为补地,以此象征女娲补天地。关于补天节,明代咸宁胡侍在《真珠船》中曾云:唐代关中平原中部的池阳“以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缕系饼投屋上,谓之补天”。韩汝庆亦在正德《朝邑县志》中记载了当地在正月二十三日有“置煎饼屋子上补天”的风俗²,则知自唐至明,关中东部都有补天节的分布。

据补天节的分布,可将关中分为两个亚区:西同亚区与乾凤亚区。

1.2.1 西同亚区 该亚区包括西安府、同州府、邠州南部的地区。这一亚区内各县基本都有补天节的记载。嘉庆《中部县志》亦称当地在正月二十日,“造薄饼置屋上,曰补天”。区内补天节的时间在正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之间³,且有这样的趋势:即越向东,节期越向后推移,以致与二十三日的老君会合并,如康熙《朝邑县志》载:“二十三日,置煎饼屋上,补天。是日仍不得食米”。因为关中东部地区的老君会一般在祀佛的同时禁止食米,据称原因是这一天若食米易得疳病⁴。疳病乃一种皮肤病,得之则鼻子溃烂。补天节在同州一带推迟至二十三日,与老君会合并,因此有了不得食米的内容。

1.2.2 乾凤亚区 这一亚区包括凤翔府、乾州、分州之地。该亚区无补天节的记载,但四月八日俗佛节较隆重,如凤翔“四月八日,俗谓城西灵山是释迦经行处,远近男妇咸往祈拜”⁵,明显与西同亚区不同。

1.3 陕南岁时区

该区是以秦巴山地、汉水谷地为主体的地区,包括汉中府、兴安府、商州及西安府的孝义、宁陕两厅。这里正处于南北风俗的交接地带,受到关中与川楚文化的共同影响,因此岁时民俗表现出明显的过渡色彩。

首先,在祀灶上陕南区表现出亚热带地区年节的特点,多在腊月二十四日祀灶,且较隆重,用鸡或猪首为祭礼,乾隆《平利县志》即载“(腊月)二十四日,用猪首或鸡祀灶神”⁶。显示而易见比关中与陕北区隆重得多。

其次,陕南地区普遍重视四月八日浴佛节,除在“四月初八日,山僧设斋坛,鸣钟鼓,作浴佛道场”⁷外,还有此日“家书毛虫帖子,以嫁毛虫”⁸。宁陕、西乡等县这一天同时举

1 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196

2 嘉靖《高陵县志》卷二《风俗》中亦有相似的记载

3 光绪《高陵县志》与更早的乾隆《同州府志》都记载了补天节在正月二十日,康熙《朝邑县志》等则载是在正月二十三日。

4 乾隆《同州府志》中对这一风俗记载较为清楚:“惟仰阳以二十三日祀佛,剪纸人贴门上,禁不得食米,或三、四日,惧疳病”。

5 雍正《陕西通志》引《凤翔县志》

6 乾隆《髡南县志》亦载“二十四日夜,设汤饼、洒果、鸡牲以祀灶”,嘉庆《汉南续修府志》称城固、洋县都是在“二十四日,祀灶设饴”。

7 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三十一《风俗》

8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二

行城隍庙会^①。

除以上祀灶时间与浴佛节内容不同外,陕南区与关中、陕北相比,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是汉水谷地各县在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雍正《陕西通志》称兴安州在“端阳日,官长率僚属观竞渡,谓之‘踏石’。”南郑端午节这一日也在“悬艾挂蒲,饮雄黄酒,食角黍兼相馈”的同时,“汉水上设龙舟竞渡,咸往观之”^②。

依龙舟竞渡的分布地域,陕南区亦可再划为两个亚区:汉兴亚区与商髡亚区。

1.3.1 汉兴亚区 这一亚区包括汉中、兴安两府,其沿江各县有龙舟竞渡活动的分布,尤其是西乡视端午节最重,不仅在五月五日端阳这一天“河中作龙舟竞渡戏,比赛洒水”,而且五月十五日再过一次端午节,“俗称大端节,亦有设宴庆贺者”^③。这种过大、小端午显然是湘楚地区沅澧流域的风俗^[2]。

1.3.2 商髡亚区 此亚区有商州及西安府的孝义、宁陕两厅。这里端午节不举行龙舟竞渡,如商南县五月五日“书门符、悬艾虎,儿童佩长命缕。以糯米为角黍相馈送。”^④。

2 陕西岁时民俗区域差异形成因素

由于岁时民俗是在季节性的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而生产活动与具体的地理环境不可须臾分离,因此,岁时民俗首先会受到生产活动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其次,岁时民俗形成后,在流播过程中不断接受新风俗的影响而发生变异,尤其是在一定数量的移民进入时更加显著,故移民也是岁时民俗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文化传统、行政区划等其他文化因子对岁时民俗及其区域差异的发育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这些因素在陕西岁时民俗区域差异的形成过程中,互相影响、共同发生作用。但为分析方便起见,下面分别论述之。

首先,自然条件与生产方式的不同是陕西岁时民俗产生区域分异的必要条件。

陕西省是我国跨自然地带最多的省区,省内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反映在岁时民俗上就表现出区域差异显著,尤其是一些地域性极强的岁时习俗与当地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榆绥亚区正月十五燃火塔塔习俗的形成,显然与当地盛产煤炭有关。宋代陕北已有使用煤炭的记载,庄绰《鸡肋编》卷上载:“延州亦有诗云: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可见当时延州烧煤炭十分普遍。清代陕北北部煤炭产量颇丰:神木县的“沙沟子、燕尔塔、恢昌沟、木头沟、沙窑儿、刘家塞”^⑤等处均有炭窑,出产煤炭。府谷县古石寨西的石窑子,“其窑口严冬温气上腾,东为林园会,俱出石炭”,县境内西折家山、东折家山,“二山皆黑,产石炭。”^⑥绥德也是当时重要的煤炭出产地^⑦。这里的煤炭出产不但供自己消费,

① 道肖《宁陕厅志》载“四月八日,作城隍会。乡民俱赴城隍庙庆祝。”嘉庆《汉南续修府志》载西乡亦是“四月八日,‘城隍社诞’,居民报赛。是日,以大麦碾为索,各相馈送,以示新”

②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二

③ 民国《西乡县志》第一册“岁时”

④ 民国《商南县志》卷二

⑤ 康熙《神木县志》卷一《窑口》条

⑥ 乾隆《府谷县志》卷二《山川》

⑦ 光绪《绥德州志》卷三《物产》条下也称“石炭,出西川巡检司等处。”

而且还有多余出产运至外地，“南岸河地颇宽平，舟楫聚此，运石炭焉”¹。丰富的煤炭资源，为火塔塔习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由于垒火塔塔可用以拔灾禳祸，故陕北的火塔塔不仅仅在正月十五使用，一些重要的节日如冬至节与除夕也有垒火塔塔的习惯：“元旦夙兴，烧苍术，以石炭烘于院内、门外”，“长至日，设肴果，祀祖考，并祖考冢前以石炭烘火”²。

陕南汉兴亚区龙舟竞渡的分布也与当地的地貌条件密不可分。尽管陕南区端午节龙舟竞渡习俗是由川楚移民带入的，但其分布却受到当地地形的制约。由于陕南地处山区，河道虽多，但大多水流湍急、滩多，不利于航行，因此端午节龙舟竞渡仅分布在城固、西乡、紫阳、白河等地，这里位于汉江串珠状盆地内，河谷开阔，水流平稳，适于竞渡的进行。应该说龙舟竞渡是川楚移民与陕南自然环境相契合的产物。

岁时民俗与自然地理区域及生产条件的关系也十分明显。陕南区位于北亚热带湿润地带，降水丰沛，年均气温高，山地密布着常绿的亚热带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混交林。在汉水、丹水谷地与低山丘陵地区，充裕的热量与水分条件，极适宜发展稻作农业。清代这里土地多已开辟，生产方式与相邻的川楚地区相差无几，“至髡南城，清晓出州南门，沿城水田如方卦，稻初熟，黄云千顷，叶叶带风露，皆有香气。”并且“沟塍树木极似荆襄间风景”³。故此与其他稻作农业区一样，陕南自古最重五月端午节，《隋书·地理志》中就有“汉中，五月十五必以酒食相馈，宾旅聚会，有甚于三元”的记载。作为道教源地之一的汉中，视端午节在道教基本节日上元、中元、下元三元节日之上，可见端午节在当地风俗中的重要地位。究其原因，不外是时值长江流域天气酷热、瘴气盛行的季节，需要举行一些拔禳活动，正如《荆楚岁时记》所云：“荆楚人以五月五日并踏百草，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以禳毒气”。因此，俗重五月端午正是亚热带地区年节的特点。

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位于中温带半干旱气候区内，降水稀少，变率大。地貌以黄土丘陵为主，地形破碎，“寸步皆山，坡高岭陡”。同时黄土的直立性又使得这里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土性干燥，雨泽稍有不调，禾苗即行枯槁”⁴。因此，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当地简单、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此相适应，人们在年节活动中多利用未经加工的原材料，或用生活资源来表示对节日的庆贺。检绥亚区的火塔塔就是直接奖原煤燃烧，形成蔚为壮观的年节景象。

此外，四月八日浴佛节上，也反映出自然条件在岁时习俗形成中的影响。陕南区与陕北虽同重四月八日的浴佛节，在节日庆祝活动中加入了一些世俗化的内容。但这种世俗化的内容又因南北地域的差异而表现不同：陕北在这一日举行大型的求子活动，与同处温带的大多数北方地区相同；陕南则因地处亚热带地区，农历四月初八已是初夏时节，蚊虫肆虐，故有书毛虫帖子、嫁毛虫的内容。这种同一节日中活动的内容不同，明显是由自然地理条件差异造成的。

其次，川楚移民对陕南岁时习俗的演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代中期陕南秦巴山地地区接纳了大量川楚移民，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陕南地区一些岁时习俗的演替。

1 乾隆《府谷县志》卷二《山川》

2 乾隆《府谷县志》卷之四《风俗》

3 清·王昶《商洛行程记》，载《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六编

4 清·卢坤《秦疆治略》延长县

明末清初,秦巴山地与汉水谷地“地当冲途”,战乱频仍,“鼎革之际,七遭兵燹”^①,致使“居民俘戮殆尽”^②,当地人口剧减,土地荒芜。清代中叶起,陕西官府开始大力招徕各省贫民开山垦荒,充实本区:“康熙年间,川陕总督鄂海招募客民,于各边邑开荒种山。邑多设有招徕馆,又饬州县选报绅士、耆民充当乡正,宣讲圣谕,城中朔望、山内场集均为讲演”,同时“责成地方官实力奉行”^③。由于政府的极力推动,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自乾隆起,至道光年间大量接纳移民^[3]。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湖广客籍约有五分之一,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之一”^④。如褒城县在乾隆初年,就已“楚民流寓甚众,置田过粮”^⑤了。光绪《洵阳县志》也吟道:“洵河大半楚人家,夜夜篝火纺手车,宝庆女儿夸手段,明年多种木棉花”。大量移民的迁入,使当地“风俗丕变”,以致“四方商旋聚而成俗,其间冠婚丧祭之仪,有沿客习而变者。”^⑥尤其是众多楚人的进入对陕南风俗有较大的影响。如在腊月二十四日小年祭灶,四月八日书毛虫帖子以嫁毛虫,五月端午龙舟竞渡明显都与沅澧流域的风俗相同^[4]。当然陕南与湘楚地区相同的自然条件与经济背景,也使移民原有的风俗习惯难以发生大的改变。

不过移民对移入地的风俗影响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如商州水道条件虽好,但没有发现龙舟竞渡的记载。推其缘由,当是商州内的移民来源分散,如光绪《孝义厅志》中所称:“土著者十之一,楚、皖、吴三省人十之五,江、晋、豫、蜀、桂五省人十之三,幽、冀、齐、鲁、浙、闽、秦、凉、滇、黔各省人十之一”,无法以某地移民为主,形成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具有优势的社会组织群落,因而移民风俗不仅不能以原有的面貌继续存在,反映在此后的延续下,分散的移民不断受当地土著习俗的浸染。如商州地区在正月十五用面制灯盏燃之^⑦,就与关中相似,显然是各地移民都接受了原住民的风俗。

最后,文化传统与行政区划在岁时民俗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节日习俗形成特定的仪式并固定下来后,其初始意义在流播过程中渐被人忽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改变,一些习俗已远离其最初的蕴意,但人们仍将它们作为传统接受下来,并传承下去。关中区曾是历任中原王朝的都城所在,当地民俗受这种悠久文化传统的影响,保留了许多古老的习俗,如正月十五制面与补天节,都是这种古老传统的表现。据《开元天宝遗事》中载,唐代关中在正月十五制面茧作为当时的时令食品,显然与祈蚕丰产有关。后虽然关中不再为蚕茧产区,制面茧的原意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隐去,但这一习俗在关中平原流传下来。至于清代面茧以鼠为形,大约是因为鼠类繁殖力强,民间用此暗喻丰产及人丁兴旺,因此又有“年轻妇人袖窃茧儿饼食之,以求生育者”^⑧的新习俗。此与北方现有在年节中包鼠形饺子的习俗有同工异曲之妙。

行政区划对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及岁时区的形成亦有相当的影响,尤其是统县政区对

① 道光《石泉县志》卷四

② 《商洛行程记》

③ 清·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丛书集成》本

④ 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⑤ 道光《褒城县志》卷三

⑥ 雍正《陕西通志》卷45引《石泉志》

⑦ 乾隆《髡南县志》载:“(正月十五)用荞面蒸面盏燃灯,按十二月,以卜雨泽,散照房室,谓之‘攘火灾,照毒蝎’。”

⑧ 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196

岁时亚区形成的作用较为明显：陕北区的延安亚区与榆绥亚区基本上与当时的延安府与绥德州、榆林府为界。关中补天节的分布西止于西安府周至县，自此县以西即为凤翔府，而遍检凤翔府各县县志均无补天节的记载。表明自宋代以来，由于凤翔府与西安府分离，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分属不同的高层政区，两地民众在文化中心的取向上产生不同，致使两地文化现象发生分异，导致了关中地区文化要素大多截然以西安、凤翔为界。补天节地域分布的差异成为行政区划对文化要素的地域分异产生影响的又一例证。而相反在同一政区内，尤其是同一统县政区内，由于共同文化价值取向一致——即趋向于行政中心，区内文化现象发生整合，致使文化亚区的形成。如陕北四月八日求子节的分布，其界线明确以延安府为限，区内各县几乎毫无例外都在此日求子祈福。这表明延安府内各县在长期共属同一统县政区下，府内文化现象发生整合。不过，在岁时区的形成上，行政区划的影响力较亚区明显减弱。如商州虽然行政上长期从属于西安府，一些风俗与关中相同，但其岁时民俗更多的是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表现出亚热带岁时民俗的特点：如四月八日书毛虫帖子、嫁毛虫，腊月二十四日小年祭灶等。此外，关中与陕北区的界线横贯郿州，并不以郿州与西安府间界线为界，也表明了行政区划在岁时区界线形成上的影响力显然不足。

综上所述，以上论析了陕西岁时民俗的区域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其实岁时民俗的区域差异是陕西整体文化区域分异的一个表现方面。据笔者的研究，陕西全省的文化要素大都可以分为三个区域，无论是方言、戏剧、婚俗、丧俗、民居等文化要素都可以得到证明¹，并与上述区划方案可以相互印证。因此，清代陕西岁时民俗的区划方案恰好反映了陕西作为高层政区，因有南、中、北三个不同的地域，在各地区自然条件、人口来源的差异和其他文化因子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三个风格迥异的文化区。

参 考 文 献 (References)

- 1 Song Zhaolin, Li Lulu. The Culture of Ancient Holidays in China.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91. (In Chinese) [宋兆麟, 李露. 中国古代节日文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 2 Zhang Weiran. Study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Hunan Provinc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4~168. (In Chinese) [张伟然. 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164~168.]
- 3 Cao Shuj.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 in China, Volume Ⅵ. Fuzhou: Fujian People Press, 1997. 120~125. (In Chinese) [曹树凡. 中国移民史(第六卷).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120~125.]
- 4 Zhang Weiran. Study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Hunan Provinc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4~168. (In Chinese) [张伟然. 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164~168.]

作 者 简 介

张晓虹，女，1965年生，讲师。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同年留所从事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工作。发表《清代陕西婚俗地域差异的初步研究》等多篇论文。

1 张晓虹. 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博士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1997.

THE REGIONAL DISCREPANCY OF THE FOLK CUSTOMS IN SHAANXI DURING QING DYNASTY

Zhang Xiaoh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Key words the seasons and folk customs, regional discrepancy, Shaanxi Qing dynasty, cultural geography

Abstract

The procession of the seasons and folk customs is one of the major contents of cultural geographical study.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t contents about the procession of the seasons and folk customs in different areas in Shaanxi province during Qing Dynasty, and there also existed some discrepancies in the aspect of the date of festival. Therefore, Shaanxi provi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seasons and folk customs, namely,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during Qing Dynasty.

The region of Northern Shaanxi, including Yan'an, Yulin, Suide, and Luochuan states and Fu county which located in northern Fu state, had the obvious features that Jizao (offering a sacrifice to kitchen god) was held at night on December, 23 (lunar calendar), and Huotata (a tower-like shaped with coal) was burned to fete the Festival on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While in Central Shaanxi, including Xi'an, Tongzhou, Fengxiang, Bin, Qian states, and south Fu State, the local people not only generally lit the special lamps which were made of wheat flour everywhere in their houses, but also celebrated Butian Festival (mending heaven festival) on the 20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especially in northern parts of this area at the same time. In Southern Shaanxi, Jizao was on the 24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and there existed another custom, dragon-boat race (the 5th day of the 5th lunar month) along Han River, which became a different feature compared with Northern and Central Shaanxi regions.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discrepancy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seasons and folk customs in Shaanxi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local natural conditions, migration, and cultural tradition, it was also important factor that had cause regional discrepancy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Shaanxi.